

建党的 那些人与事

王晓明 主编

东方
曙光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东方曙光

建党的 那些人与事

王晓明 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曙光：建党的那些人与事/王晓明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5154-0084-6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史料 IV. ①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6346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朱云波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古 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6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26 幅 24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第一章 最早成立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001

一、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 /002

陈独秀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还是倡导社会主义？/党的名称叫什么？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

二、一群有胆有识的上海人 /012

陈独秀：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首任总书记 / 李汉俊：“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 李达：“理论界的鲁迅”

三、工人的觉悟和觉悟的工人 /026

“我们就是要教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 / 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 / 建立工人自己的工会

第二章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 /035

一、北京党组织成立 /036

李大钊在北京思想文化界上空敲响了晨钟 /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 “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

二、北京大学里的共产党人 /047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 张申府：复杂而又难以言尽的一生 / 张国焘：从中共早期创始人到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 刘仁静：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

三、工、人合起来就是天 /059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人注意的形式，启发工人觉悟 / 北京青年团把关不严，团员中混进了个别北洋军阀的特务 / 李大钊对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说：“工、人合起来，不就和天一样大吗？”

第三章 九省通衢有了共产党 /065

一、武汉党组织的成立 /066

武汉：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 武汉中学与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 神秘的“刘伯垂律师事务所”

二、青年才俊汇荆楚 /072

董必武：在李汉俊帮助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 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 / 陈潭秋：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 包惠僧：一大时陈独秀的私人代表 / 刘伯垂：受陈独秀指派回武汉筹建湖北的党组织

三、他们的工作不只是宣传 /085

董必武等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交谈时，一人手上拿一本汉英词典，一面谈，一面翻词典 / 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是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第一次胜利 / 《武汉星期评论》，华中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

第四章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091

一、长沙党组织的成立 /092

新民学会有五条会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 五四运动后，新民学会逐渐成长为湖南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中心 / 为建党，毛泽东两上北京，三到上海

二、湖南多志士 /102

毛泽东：湖南杰出的中共领袖、新中国的缔造者 / 何叔衡：年纪最大的中共一大代表，人们叫他何胡子，说他是一头牛，一堆感情 / 彭璜：毛泽东赞他志高有勇，他却因感情的重创，在风华正茂时怆然逝去

三、湖南共产党人的“三十节” /111

毛泽东写信告诉向警予说，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 何叔衡推荐了多名先进分子入党，被称为湖南建党的“老母鸡” / 毛泽东写夜学招学广告有秘诀

第五章 北大学子广州建党 /119

一、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立 /120

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为什么首先在广东工人中传播开来？/ 最早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是杨匏安 / 想找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苏俄使者，最先遇到的却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

二、“革命三谭” /125

“革命三谭”的不同命运 / 陈公博：从中共一大代表到中国第二号大汉奸 / 沈玄庐：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三、“共产党要创造一个无寄生虫之社会” /139

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向陈独秀表示折服 / 由陈独秀倡议创办的“宣讲员养成所”，经费高达 30 万元，是普通中学的 10 倍

第六章 北京党组织帮山东建党 /145

一、济南共产党组织的成立 /146

王乐平创立的齐鲁书社，在思想传播和人员组织上为济南党组织的诞生做了准备 / 一群二三十岁的青年学生建立了山东党组织

二、“尽善尽美唯解放” /151

济南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王尽美，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辞世的 / 邓恩铭：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 教师王翔千 / 王志坚：被误杀的共产党员

三、引导工人为自己谋幸福 /160

彻底地怀疑一切既存的制度、习俗和学说 / 要让所有工人懂得：不做牛马的唯一法子“是结合团体”

第七章 法国和日本也有中国共产党 /165

一、旅法共产党组织成立 /166

1919—1920 年，有 1600 名青年踏上前往欧洲的路 / 从工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 1923 年 2、3 月间，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入党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法国 /172

蔡和森：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 / 赵世炎：牺牲时年仅 26 岁 / 宰相之材——周恩来

三、争取学生权利和维护国家利益 /179

留法学生的“二二八”运动 / 长达两个月的拒款运动 / 进军里昂中法大学，抗议该校拒收中国勤工俭学学生

四、旅日共产党组织 /184

施存统随身携带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从上海乘船前往东京建党 / 后来施存统被捕并被驱逐出境，而周佛海逐渐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五、两名半途而废的共产党员 /186

施存统：脱党而未叛党 / 周佛海：从背叛共产党到沦为可耻汉奸

第八章 中共一大分两阶段进行 /195

一、邀请各地代表到上海 /196

参加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除了马林外，还有一位鲜为人知，叫尼克尔斯基 / 李达和李汉俊给每位外地代表寄了 100 元路费；张国焘第一个到，陈公博偕新婚妻子最晚赶到 / “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二、会议首先在上海开幕 /209

后来确认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和地址颇费了番功夫 / 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掀开门帘，闯入会场，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 / 李达的妻子建议：在嘉兴的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

三、在嘉兴南湖闭幕 /221

关于中共一大闭幕的时间，有好几个说法 / 共产党成立宣言放在陈独秀的包中，后来竟没有下落 /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后 记 /233



第一章 最早成立的共产 党上海发起组

一、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

陈独秀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辛亥革命后，上海社会极其混乱。用陈独秀的话说，有困苦卖力毫无知识的劳动者；有直接或者间接地在外国资本势力下讨生活的奸商；有卖伪造的西洋药品、卖彩票的欺诈取财者；有淫业妇人；有无恶不作的流氓、包打听、拆白党；有流氓式的政客、政客式的商会；有做冒牌杂志骗钱的黑幕文人和书贾；有控制大部分工厂劳动者的封建帮会势力；还有一部分青年有志的学生。

那么，上海社会是哪一种人最有势力呢？首先，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大权都握在洋人手里，但在社会底层，大部分工厂劳动者，全部搬运夫，大部分巡捕，全部包打听，这一批活动力很强的市民都在青帮支配之下。上海的黑帮势力之大，是不难想象又是不可想象的。上海没有任何团体比黑帮的组织大，黑帮老大的命令比政府部门的政策更具有效力。

上海的思想界也是一潭死水，偌大的上海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分子的学校，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上海所闻的所见的，到处是算盘声、铜钱臭。拜金主义的臭气从西方飘扬而至，弥漫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渗透到每个毛孔里。

陈独秀眼见这种“龌龊社会”，禁不住悲呼：“上海社会若不用猛力来改造一下，当真拿他做舆论和文化底中心，那么中国底舆论和文化可真糟透了。”

同时，上海又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工人运动的中心。



中英《南京条约》签署场景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通商口岸。1853年起，外商陆续在上海开设船厂、丝厂、纱厂、烟厂和电灯厂、自来水厂等企业，我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由此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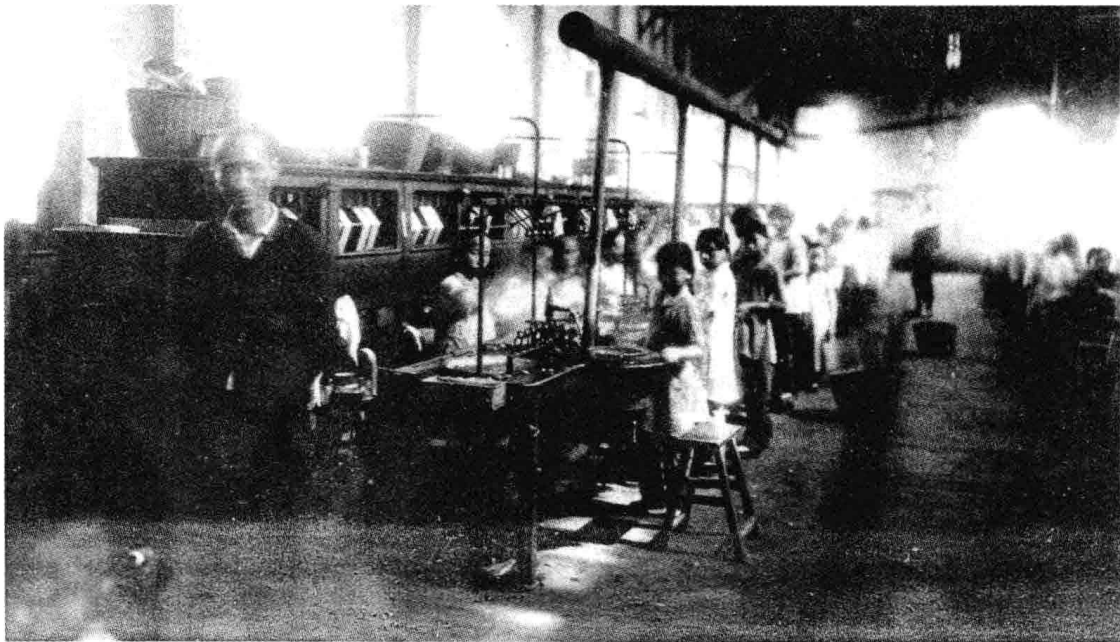
1862年以后，清朝政府在上海设立制炮局、江南制造总局、机器织布局 and 轮船招商局。随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首先在上海兴办，上海逐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上海的工人在这种“蜗居社会”中尤其艰难。“从早到晚苦一天，所得不过两角钱。买得柴来难买米，可怜怎样度常年。”这首在上海广为流传的《劳动歌》，生动再现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工人的悲苦生活状况。在中外企业中，工人遭受打骂以致被开除是常见的事。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工厂实行抄身制、包工制等，肆意侵犯工人的人身权利。工人劳动和生活的状况非常悲惨，他们所受的压迫与剥削，在各国工人中是罕见的。

上海，正是个腐朽与进步同在、黑暗与希望并存的城市。一方面，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缩影，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在这里横行，整个社会纸醉金迷、蜗居不堪；另一方面，也有希望的力量，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具有爱国正义感，要求争民主、争生存、争主权，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面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们并没有忍气吞声，甘受压榨，中外企业的工人先后进行过无数次自发的罢工斗争，参加罢工的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千人。

1918年4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上海纱厂工人多次举行罢工，每次罢工人数量平均在三四千人以上。五四运动中，6月5日，上海纱厂5000多男女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罢工迅速波及各行各业工人。数日间，全市六七万人投入政治大罢工，形成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的洪流，工人



上海丝厂的童工

阶级开始了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到1920年，中国产业工人发展到195万人左右，其中上海不下50万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并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即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他大胆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在中国擎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青年杂志》开始创办时比较艰难，刚开始发行时，也不过一千册左右，但是陈独秀对《青年杂志》的前途很有信心，陈独秀已经预见到进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意义和远大前景了。他对人说：“开始有千册就不错了。有十年八年工夫，《青年杂志》一定有很大影响。”

《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得到了胡适的加盟助阵，他时常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一些译文或者见解新颖的文章。

同在这个春天，《青年杂志》又吸引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留学日本的大钊，深受国内反袁斗争形势的鼓舞和陈独秀《青年杂志》的感染，满怀革命激情，写下了热情洋溢、活力四射的《青春》一文。李大钊振臂高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接到李大钊寄来的《青春》，陈独秀一气读完，深深为李大钊的浩然正气所触动，陈独秀忽又想起章士钊对李大钊的评价：“才不如识，识不如德”。他嘴角不禁浮起一丝笑意，自言自语道：“守常（编者按：指李大钊，下同）其文如其人啊！”

正如陈独秀所料，《青年杂志》影响迅速扩大开来，但是树大招风，康有为于9月20日发表致总统总理书，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纳入宪法”。这显然与《新青年》所主张的革新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陈独秀针锋相对，在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2号上，他提出学习西洋文明的主张，认为“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文学革命风潮。此后，《新青年》的影响继续扩大，在国内有发行处74处，国外已发行到新加坡。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随即，他向教育部请示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在北京大学校园里一时议论纷纷，赞同与贬斥沸沸扬扬，引发了一阵风波。风波平息下去后，陈独秀住到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新青年》编辑部同时搬到了北京。

1917年1月底，陈独秀为继续倡导文学革命，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写了《文学革命论》：“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豪气干云地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始终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活跃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最前

线。《新青年》直接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并推动它在全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上海乃至全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1919年6月，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遭到反动政府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了98天才被释放。这期间陈独秀受李大钊的影响，思想慢慢发生转变，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北洋军阀政府派代表赴巴黎参加会议。有识之士对于此次会议，无论是其正义性，还是中国与会的前景，都充满疑问。

4月30日，在巴黎和会上，操纵会议的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掠夺的全部权利的正当要求，反将其全部转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凡尔赛和约”，强迫中国政府签字。

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因此，当“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内容传到中国后，北京的爱国学生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和报道运动的情况，并撰写评论文章，指导爱国运动向深入发展。他写道：“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北洋政府大批逮捕爱国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新的斗争。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等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给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6月5日这天，上海要举行全体罢市的消息在大街小巷流传，临近中午的时候，果然有人起来罢工了。曹家渡日本人开的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全体罢工了。不到两小时，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工人也相继罢工了，两万多人不干活了，声援远在北京的五四运动。上海工人的

上海學生聯合會 血潮圖畫增刊 十四年五月號



上海学联反映“五四”惨状的画刊

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6月11日，上海学联发出了继续斗争的传单，指出：“我们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华国民的呼声已经举世所共闻了。卖国贼3人已被罢免。我们可以恢复原有的行业了。……然而斗争仅仅是开始。山东还未收回；亚洲尚有黠武主义要请我们去推翻……中华爱国儿女必须准备对付更剧烈的斗争，方能使中国成为民治的国家。”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共发表7篇文章和73篇随感录，及时总结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

上海工人的斗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也将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并且迅速扩展到全国150多个城市，成为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还是倡导社会主义？

“朦朦胧胧的张眼一瞧，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红。这是什么？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只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的天平不公！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一霎时遍地都红！”这是1920年1月1日发表在《星期评论》第31号上的《红色新年》的一节。

马克思主义思潮来了，势如破竹，上海被卷入了这场思想的洪流之中。

当时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媒介主要有三个：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月刊；二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组织的《星期评论》；三是邵力子等创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些媒介集结了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初，陈独秀由北京回到上海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沪。《新青年》月刊是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刊物。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他同在商务印书馆、《民国日报》社、《星期评论》社工作的沈雁冰、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联系密切，共同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潮。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创刊，它一出场就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姿态，立即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震动，引起了思想舆论界的密切关注。《新青年》称颂它是“最有力的周刊”。8月中旬以后，它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开始的时候，它的销量不过一千份左右，后来越来越受青年们的欢迎，李立三、周恩来等都是深受其影响的青年。

《星期评论》在五四运动后，宣传重点放在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介绍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方面，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星期评论》周围逐渐团结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俞秀松在《星期评论》工作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很快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俞秀松担任了第一任书记。《星期评论》在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等的共同

努力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1920年6月6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和军阀政府的迫害下，《星期评论》被迫停刊。

此外，在《星期评论》刚刚创办一周时，即1919年6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在第8版上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副刊《觉悟》，主编是邵力子。《觉悟》发行的第三天，就赫然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6月18日，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一文，介绍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第二天，李达接着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深入剖析了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并比较了社会主义与著名的法兰西革命之间的不同。邵力子在1920年1月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的评论，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做个大政党”。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李汉俊在1919年10月撰写评论工潮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得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1920年5月，陈独秀编辑出版《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以大量篇幅介绍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材料，转载苏俄劳动法典，宣传劳动运动。沈玄庐与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也编辑了“劳动纪念号”，配合《新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宣传。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别的思想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反对，是不言而喻的，上海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论争的主要阵地。当时，在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中，主要有两方面的阻力：一是一些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二是主张取消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实行“无政府”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等。以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与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论战。

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思潮，鼓吹不通过斗争而摆脱剥削，主张工人联合成基尔特即行会，通过和平方法实行产业民主和产业自治。1919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讲学，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可以免去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弊害及俄国不幸命运之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梁启超、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卖的却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膏药，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张东荪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大肆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各派社会主义中的“最要善”，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和《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大家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等几篇文章，大肆鼓吹：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的什么社会主义。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早已看不惯、听不惯张东荪的这一套，他们



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与之展开了激烈论战。11月17日，李达以“江春”的笔名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来批驳张的谬论。同日，陈望道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质问张东荪曾经鼓吹社会主义，为何现在又来诅咒一切社会主义呢？想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去开发实业吗？不久，李达又写了《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地商榷》两篇重要文章，进一步推进了反假社会主义的论战。

张东荪等人显然是不会甘受批判的。12月，张东荪又抛出《现在与将来》一文，改良主义腔调更加猖狂。梁启超发表了《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支持了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论调，而且更胜一筹，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反对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

针对这种情况，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主要回应梁启超此前发表的《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指出了后文的真面目：误解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会社会主义运动。这五点，是要旨，也是要害。李达在文中逐一批驳，他指出，这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的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

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这一场大争论，究其实质，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也是采用革命方法还是采用改良办法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者们从正面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在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激烈论战的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投入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之中。争论是建立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建立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政党。

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其实还要先于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之后它就开始在中国有所发展，到五四时期在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地盘渐渐缩小，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他们最恐惧的。因此他们开始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抢夺思想领域的阵地。五四运动后的两年，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明火执仗地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反感一切强权，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诋毁布尔什维克党是“杀人放火的强盗”。

1919年6月起，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陈独秀写了《谈政治》，李达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施存统写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以及周佛海写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旗帜鲜明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批驳了“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论，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绝对自由”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揭穿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

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专政职能应该被无产阶级所取代，无产阶级专政“警察也要”、“军队也要”、“监狱也要”。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这场论战声势浩大、旷日持久，其实质是要不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这场论战，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弄清楚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就明了了。原来许多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原来混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也被清除出去。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和全国的传播，对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个时期，上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打下了扎实思想和干部基础。

党的名称叫什么？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一时拿不定主意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它是在开展了工人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是在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的筹划下，经过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而成立的。

五四运动震惊了世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非常关注五四后中国的革命形势。中俄交通打开后，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出维经斯基及其翻译杨明斋等人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找陈独秀。

在维经斯基来中国前，远东局曾经接到过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数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来中国看看。维经斯基一行来中国有着十分明确的任务：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研究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同领导五四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俄国革命和俄共经验；条件成熟的话，研讨中国建党问题等。

1920年初春，陈独秀冒着微冷的春风南下武汉。他此行是受李汉俊的邀请到武汉大学讲学。武汉学生联合会、文华学生协会在文华大学召开欢迎陈独秀的千人大会。陈独秀把出狱后的一些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悟梳理了一通，作了题为“中国存亡与社会改革的关系”的演讲。陈独秀在演讲中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是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是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该拥有田地。此时，陈独秀已经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陈独秀的演讲受到了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武汉当局却十分惊恐，下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陈独秀愤然回京。而此时，北京政府和警察署正布下天罗地网，等陈独秀一抵京就立即逮捕。于是，李大钊帮助陈独秀化装逃离北京，经天津乘船前往上海。两人趁夜雇了一辆骡车赶往天津。在旷野的雪地里，两人情绪渐好，彻夜长谈，商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之事，拉开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帷幕。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抵达上海。此前，李大钊从天津发电报，托许德珩、张国焘为其找房子。陈独秀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据许德珩回忆，“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杂志，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维经斯基等人于1920年4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上海找陈独秀，这彻底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道路。在上海，陈独秀会见了维经斯基（吴廷康）和其夫人库茨涅佐娃及翻译杨明斋。

杨明斋递给陈独秀一封信，说：“陈先生，这里有李大钊先生写的信。”陈独秀得知他们是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维介绍给李大钊认识的。李大钊在信中介绍说，维经斯基来华的目的是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陈独秀点点头，说：“我和李大钊多次谈论过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这次吴先生（维经斯基）和杨先生来华，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看来你们对中国情况知道不少？”

“不！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是从少数俄侨口中听说《新青年》和陈先生大名的，李先生也称您是上海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杨明斋回答道。

“差得远，差得远，和守常（李大钊）比，自己是个后进，”陈独秀笑声朗朗地摇摇手。几天前，陈独秀接到北京来的消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杨明斋将方言味极重的陈独秀原话翻译了一遍后，维经斯基用力点了点头，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这次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国先进分子、革命社团建立联系，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陈独秀充满敬意地点点头，他没有想到这位俄国人还能讲一口汉语，说：“吴先生想和中国先进分子取得广泛联系，到上海是最合适的地点。这里集中了各个学派和社团的各种各样的人物。隔日，我给你们介绍情况，安排你们见面。”

一段时间后，维经斯基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主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如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陈望道、李季、沈雁冰、周佛海、刘大白、戴季陶、张东荪等人。

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印象不错，他第一个写信向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介绍了陈独秀，称他是“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

1920年4月4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及将帝俄政府以掠夺手段向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一律无偿地交还给中国。4月11号，《星期评论》在第45号上立即做出反应，对于苏俄的举动大发溢美之词，认为这是“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事业。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与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首先找到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由浙江来上海的陈望道和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以及在星期评论社的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